

信心丧失与知识忠诚： 从谯周生平看蜀汉灭亡原因兼驳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

王 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对于蜀汉灭亡之原因,近年来最具影响的就是不同地域势力集团矛盾说。但仔细考察,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不足的。蜀汉内部的矛盾可能按进取者与保守者来划分会更确切一些。蜀汉的亡国,首先是其政治目标越来越无法实现,对外战争又使国贫民困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域内民众信心普遍丧失;其次是这种信心丧失恰好与当时的普遍认知汇合,以致蜀汉国家认同破裂,谯周劝降后主得以成功。谯周的人生经历恰好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变化过程。

关键词:蜀汉灭亡原因;地域势力集团矛盾说;谯周

中图分类号:K23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5-0150-10

三国之中,蜀汉虽然是最为偏僻弱小,但就政治稳定和治理状况来说却是三国中最好的^①,不过也是最早灭亡的。原因何在呢?除国小民弱、刘禅昏庸、黄皓专权、姜维黷武等古已论说的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外,今之研究者以广阔之视野亦更有发明,如从人才角度、财政角度、地理角度、亡国思潮、国家战略、诸葛亮个人心理等加以论证,应该说都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一定的历史真实。综合起来,正如尹韵公先生所说:“是政治、经济、外交、人力资源(主客矛盾)、人心变化等路线综合作用的结果。”^[1]不过,虽然如此,目前最具影响的观点还是蜀汉内部地域势力集团矛盾亡国说。

刘备入蜀之前,益州地区除汉中被张鲁盘踞外,其余地区基本都为州牧刘璋所据。刘璋又是继其父刘焉而割据益州的。汉末天下大乱,益州刺史郤俭“赋敛烦扰,谣言远闻”,汉廷不想益州也陷入动乱,任用享有清名的宗室重臣刘焉为益州牧,以入蜀稳定形势。但刘焉听说“益州分野有天子气”^[2]《刘二牧传》,865,未入蜀之前便已抱有割据益州称帝

的企图。后来虽然称帝未果,但却至少割据了几乎整个益州地区。刘焉死,刘璋继位,两父子据益州26年(188—214)。不过,刘氏父子是江夏竟陵(今湖北江门)人,对益州本土士人和豪强来说,是“客人”。虽是“客人”,但刘氏父子的势力并不弱小。因为当时还有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流入益州,刘焉对他们进行安抚笼络,引为自己的党羽,并组建出一支“东州兵”,成为他的核心军事力量。刘焉为谋称帝,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2]《刘二牧传》,867,结果激起了蜀中豪强的武装反对。刘璋继位后,“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2]《刘二牧传》,869,引起了巴、蜀豪强的大叛乱。不过,这两次叛乱,都由于东州人的拼命抵抗而平息了。因此,这里就看到了益州土著势力与刘璋为首的东州势力集团的矛盾。

后来,刘备入蜀,追随他的大量荆襄士人集团也随之入蜀,于是益州内部的势力集团又增加一股,田余庆先生称之为“新人”。照此说法,益州地区这时有三股势力,即益州本土集团、刘璋旧部的东州集

收稿日期:2013-04-14

作者简介:王瑰(1982—),男,四川崇州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巴蜀历史文化。

团、刘备的荆襄集团。不过,像田余庆先生认为的那样,在刘璋治下,虽本有“主、客”矛盾,但由于刘璋借助“东州兵”的支持,取得镇压本土豪强反叛的胜利,然后双方利益逐渐平衡、联合在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所以至刘备入蜀时,便主要体现为刘备“新人”与刘璋“旧人”之间的矛盾了(这实质上还是地域矛盾)。

不过,不少观点却并不这样认为。不管是原刘璋东州集团,还是刘备的荆襄集团,都是外来势力,都是益州本土势力集团的利益瓜分者。由于根本利益的冲突,“外来地主势力与本地地主势力的矛盾是不会消除的”,“共同的利益将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拉到了一起,联合对付排外的益州土著集团”^[3]。有人指出,“坚定地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团结和信任东州地主集团,排斥和控制使用益州土著集团力量”^[4],正是蜀汉的用人路线。因此,蜀汉的灭亡,最终也就是益州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结果^②。

不过,窃以为蜀汉的地域势力集团矛盾是完全被夸大化了的,蜀汉的灭亡其实是蜀汉士人和民众对“兴复汉室”信心丧失这一普遍认知基础上得出的共同结论。这一点,从因为成功劝降刘禅而身负骂名的蜀汉大学者谯周的人生旅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一 谯周早年经历与蜀汉初年所谓的地域集团矛盾

(一)谯周其人与出仕

谯周,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国人(今四川西充县)。其《本传》云:“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長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2]《谯周传》,1027}谯周自小就是个极度爱好学术的苗子,长大之后亦以学术为业,性格上也很有大学问家的修养和气度,终其一生也取得了三国时期学术大师的成就。谯周生于哪年,其传并未明言,但他在西晋泰始五年(269)曾说“今吾年过七十”^{[2]《谯周传》,1033},古人记虚岁,故可知其生于建安五年(200)。

谯周好学,是有家学渊源的。谯氏本是巴西大族。武帝时,有谯隆为上林令,并荐落下闳于武帝。西汉成哀之时,有谯玄以精《易》仕进,为谏议大夫。王莽篡汉,谯玄辞官回乡。公孙述据蜀,谯玄宁死不

应征,子谯瑛纳钱八百万活之。光武平蜀,下诏褒奖,赐还家钱,其子不仕,但仍继父学治《易》。谯周之父,亦是学问大家,“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2]《谯周传》,1027}。

不过,谯氏自谯玄之后,似乎并不热心做官。谯玄之子不仕,谯周父“州郡辟请,皆不应,州就假师友从事”^{[2]《谯周传》,1027}。“师友从事”听起来是州府属官,其实没有任何执掌,只有州刺史老师或朋友的名誉。谯周之子也有不好仕进者,“少子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2]《谯周传》,1033},虽逢西晋一统也不仕宦。

但是,谯周却出仕蜀汉了。谯周出仕蜀汉,据其本传是在诸葛亮执政领益州牧后,即建兴元年(223),时年二十四^③。年纪轻轻即投身蜀汉政权,看来作为益州土著,他对这个政权是比较认同的。不仅他认同,从当时为劝进刘备称帝而上书言讖纬诸人“皆蜀中封建地主有官秩者”^④来看,益州籍士人普遍都是认同蜀汉政权的。但是,不是说蜀汉初期面临着所谓“主客”、“新旧”矛盾吗?难道他们是迫于刘备的淫威才勉为其难的?其实不然,应当是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纲领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在这个认同之中,地域矛盾表现得并不突出。

(二)进取者与保守者:对蜀汉初期地域集团矛盾的质疑

1. 从刘备的政治目标和实践看,不会突显地域势力集团矛盾

认为蜀汉内部存在着按地域划分的势力集团矛盾,首要根据是蜀汉虽割据一隅而统治势力的地域构成却比较复杂。前文对此已有述及。但是,地域构成复杂就一定会有矛盾吗?这不可一概而论,当具体分析。具体到刘备身上,这些矛盾或许会有,但不会很鲜明,这是由刘备的建国路线和人才网罗特点所决定的。

刘备虽出身汉家宗室,但早已沦入社会底层,“与母贩履织席为业”^{[2]《先主传》,871}。生逢汉室倾颓之际,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各地军阀趁势崛起,汉家一统秩序轰然崩溃,刘备便立志“兴复汉室”。受汉献帝“衣带密诏”后,“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也就成为他与曹操为敌并周旋到底的政治纲领和合法依据。刘备所网罗的人才,都是与他抱有相同理想之人。如诸葛亮隆中对,即可看出他早就把兴复汉室的道路给规划好了。曹操征荆州,荆州士人中认同刘备政

治纲领的就归附他,不认同的就东归孙权或北投曹操。如荆州零陵人刘巴,当刘备“奔江南,荆、楚群士从之如云”时,“而巴北诣曹公”^[2]《刘巴传》,980;后为曹操出使招纳荆州江南三郡,事不成,南奔交趾,诸葛亮亲自追劝其归附刘备,不从;后辗转至成都,逢刘备取益州,乃归附刘备,刘备虽知其大才,但却心存芥蒂,“其欲还北,假道于此,岂欲成孤事邪”^[2]《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982,而遭到刘备的弃用。

不过,当刘备入蜀时,由于毫无益州根基,确实面临主客矛盾。刘璋请刘备入蜀,主簿巴西黄权就说“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2]《黄权传》,1043。这里的“客”指刘备,“主”指刘璋。即便认为刘璋治下东州势力与益州本土势力面临刘备进入时,都转化为“主”,这个“主”的内部也是有着矛盾的,只是这个矛盾不体现在东州与益州的地域之别上,而是体现在守成或者进取上。

刘璋继承父职,领有益州,实际也是这种矛盾偶然达成一致的结果。《华阳国志》云:“州帐下司马赵赍、治中从事王商等贪璋温仁,共表代父。”^[5]卷五《刘二牧志》,341 赵赍,巴西豪族出身,原为汉太仓令,刘焉入蜀时,辞官随同。王商,广汉人,家世显官豪族,其曾祖父王堂有名于天下,《后汉书》有本传。王堂之妻过世时,王氏“内外冠冕百有余人”^[5]卷十《梓潼士女》,616。刘璋时,王商为益州从事,颇得信任,“璋懦弱多疑,不能党信大臣。商奏记谏璋,璋颇感悟”^[2]《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967。刘璋由于温仁,得到赵赍与王商的共同表荐。赵赍图的是取而代之。当“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时,赵赍“因民怨谋叛”,“蜀郡、广汉、犍为皆应赍”^[2]《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869,最终虽未得逞,但其进取之心可见一斑。而王商对刘璋的温仁取的是保境安民。凉州马超请刘璋联合,王商劝谏道:“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2]《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967 刘璋从之。与刘璋抱有相同态度的,还有上文提及的黄权。黄权明确为刘璋道出了“可但闭境,以待河清”^[2]《黄权传》,1043 的守蜀原则。赵赍与王商之间的认同,反映的就是进取者与保守者的认知取向差异点的偶合。

在迎接刘备入蜀事上,蜀郡人张松和扶风人法正,一本土、一东州,都是积极进取者,二人联合出卖

了刘璋。张松本无出卖刘璋之心,只因代表刘璋诣见曹操时不受重视^⑤,看不到归附曹操的大好前途,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刘备。法正则因没有得到刘璋理想的重用,“忖璋不足与有为”^[2]《法正传》,957,便与张松相善。二人地域虽不同,在一致的追求下,便结成了同盟。

同是东州人,就一定团结吗?法正入蜀早年的事迹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法正无疑是积极的进取派,到蜀中投靠刘璋,他是想大有作为的,但是他的同乡并没有帮助他,反“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2]《法正传》,957。显然,法正和他的同乡们并不团结,他们也有安宁求生者和积极进取者之别。

还有河南人庞羲,与刘璋家族有通家之好,曾随献帝在长安。刘璋兄刘范因参与讨伐李傕、郭汜失败而死,长安乱,庞羲“乃募将焉诸孙入蜀”^[2]《刘二牧传》,867,即请人打听寻找刘焉诸孙,然后一起带入蜀中。以此来看,他对刘家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所带入的刘焉诸孙中就有刘璋的儿子,因此刘璋对他相当感激。刘璋继位后,汉中张鲁叛离,刘璋把讨伐张鲁的重担交给庞羲,“累遣庞羲等攻鲁”,虽然庞羲“数为所破”,刘璋仍“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2]《刘二牧传》,868,说明刘璋是很信任庞羲的。但是,有人以庞羲私自征兵,“构羲于璋,璋与之情好携隙”^[5]卷五《刘二牧志》,346,庞羲的进取热情立刻就被扑灭了。于是,建安五年(200),当巴西赵赍起兵西向时,他便作壁上观,以至刘璋众散见杀。庞羲毕竟是进取的人,赵赍兵败被杀,他怕刘璋追究而加兵于他,打算起兵反抗,“羲惧,遣吏程郁宣旨于郁父汉昌令畿,索益兵”^[5]卷五《刘二牧志》,346,但遭到汉昌令坚定的拒绝,庞羲征兵不成,只得向刘璋请罪。刘璋原谅了他,但他对刘璋仍心存不满,所以张松劝刘璋请刘备入蜀时说庞羲“恃功骄豪,欲有外意”^[2]《刘二牧传》,868,最后庞羲出现在劝刘备进位汉中王表的名单中,且位列第三。

所以说,刘备入蜀之时,益州内部的矛盾,已经不是益州势力与东州势力的矛盾,也不能用地域差异去解析,实际上益州势力内部、东州势力内部、益州与东州之间、刘璋与其世交亲信之间都是彼此交织着矛盾的。但这些矛盾却不复杂,就是简单的在乱世中求进取者与求自保者的不同。进取者都嫌弃刘璋提供的平台不够个人发展,想有所突破,不管是推翻刘璋、取刘璋而代之,还是引入“英雄之主”,

必居其一。保守者则力求避开纷扰和战火，先保境内安宁，待形势明朗后再图后计。

不过，刘备入蜀前，益州虽有一批进取者，但并不一定就赞同刘备的政治纲领。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他们既然有进取之心，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提供给他们进取的平台，而以“兴复汉室”为政治纲领的刘备是能够提供这个平台的。赤壁之战后，刘备据有荆州，虽然还囿于一隅，但处境大为改观，立功成事之才德初显，“兴复汉室”一时间颇可期待。诸葛亮认为：“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7]《刘备传》注引《零陵先贤传》，981 对此，进取者张松和法正的转变很具有代表性。

随着曹操势力的壮大，刘璋也是有心靠拢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征荆州，大有荡平荆、扬的势头，这时，璋“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试图结好，曹操接受，回应以“拜肃为广汉太守”^[2]《刘二牧传》，868。张肃被曹操看重，让刘璋感到了积极信号，于是再遣张松诣曹操。张松是张肃之弟，刘璋这次遣张松见曹操而不致敬、不送礼，当有深意。《益都耆旧杂记》云：“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持节操，然识理精果，有才干”，而张肃仅“有威仪，容貌甚伟”^[6]卷七十五《刘焉传》注引，2435。显然，刘璋遣张松诣曹操，是要利用张松的聪明才干，很可能是派他去商议益州归附朝廷的问题。张松若能完成任务，必是大功一件。只是曹操胜利在望，并不待见张松，只给他越嵩比苏令的官职。张松欲求上进而不得，心怀怨恨。适曹操战败赤壁，张松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便转向刘备，劝刘璋与曹操断交，说：“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2]《刘二牧传》，868 法正亦是如此，不得已奉使刘备回来后，便“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2]《法正传》，957。因此，对进取者而言，只要刘备能提供平台，转向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益州境内毕竟还有很多保守者，又该如何处之呢？

其实，所谓的保守者，只要是出仕为官的，多少总是有政治欲望的，只是在追求上显得并不那么执着与急躁而已。对他们而言，只要有“汉室可兴”的信心，还是能拉拢的。那么，怎样才能让他们有信心呢？对当时的刘备来说，就是要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张松、法正能转向刘备，就在于他赤壁之战能够打败不可一世的曹操。对于益州保守势力来说，刘备只要能打败刘璋，客观上就能为他们树立信心。

事实也是如此。刘备自葭萌南还，兵向成都，于涪城（今四川绵阳）击败刘璋军，于是奉命“督绵竹诸军”以拒刘备的李严，索性“率众降先主”^[2]《先主传》，882。当刘备兵围成都时，享有天下盛名的许靖“将逾城降”^[2]《法正传》，959。早先劝拒刘备，主张“但闭境，以待河清”的黄权，在刘璋投降后，也归附刘备，后来还成为刘备的重臣。当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据有汉高祖取天下最初的完整基地时，这种信心便达于极盛，再加上光武中兴的前事，刘备再蹈高祖之迹“兴复汉室”也并非不可能。蜀汉大臣请刘备称帝表中说“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2]《先主传》888，正反映了这种信心。

当然，在此之外，刘备入蜀后“人尽其才”的策略，对刘璋旧部、益州士族以及毛遂自荐者，不管是主动投诚的，还是曾为刘璋尽忠反对过他的，只要愿意归附到他的旗帜下的都量才录用，也为保守者树立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才会出现“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莱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2]《先主传》，882-883 的高昂局面。

但是，就在刘备称汉中王后的数年内，蜀汉不幸之事接连发生。关羽失荆州，法正英年辞世，刘备东征大败、病卒白帝，汉嘉太守黄元进兵攻临邛县反，南中“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越嵩夷王高定亦背叛”^[2]《后主传》，894，刘备苦心经营的事业盛极而衰，仿佛就要一朝崩溃，“兴复汉室”也似乎突然遥不可及。不过，诸葛亮通过成熟高超的政治艺术，使全国继续保持了信心。陈寿云当时“人怀自厉”^[2]《诸葛亮传》，930，蜀郡张裔留守丞相府长史常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念忘其身者也”^[2]《张裔传》，1012，可见蜀中各阶层人士都是满怀信心为国家服务的。吴国使者张温还“将蜀政比作传说辅高宗中兴殷商，周公佐成王隆盛西周”^[7]125，在外人看来“兴复汉室”在当时也曾一度大可期待。

2. 从具体案例看，是个人问题，而不是集团矛盾

蜀汉初期，出现过几起遭人诟病的案子，不少研究者从中解读出地域矛盾和新旧矛盾的信息，但细考诸史籍，这些案子并不具有集团矛盾代表性，只是个人问题。

广汉人彭莱之死,常被看成刘备荆襄集团与益州集团矛盾的一个例子。彭莱本被刘璋髡钳为徒隶,后得遇于刘备,拔为益州从事。“莱起徒步,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兹甚”,诸葛亮认为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劝刘备疏远他,刘备便任他为蜀中僻远的江阳郡守^{[2]《彭莱传》,995}。彭莱不满,找到马超说:“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2]《彭莱传》,995}马超惶恐,报告刘备,彭莱遂被下狱处死。彭莱一遇不如意,就鼓动马超,有他在确实容易扰乱蜀汉正常的政治秩序,诸葛亮对他的评价得到了证明。而且,其《本传》明言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2]《彭莱传》,995},况且在温仁的刘璋统治时期,他被髡钳为徒隶,他含蓄表达造反意图所找的也是羁旅托国的马超而非益州本籍人士。彭莱之难容于主流群体是很明显的。诸葛亮劝刘备处理他,并不能说成是不同地域集团矛盾的体现。

建兴元年(223),诸葛亮杀益州从事常房之子,并徙其四弟于越嶲郡,也是一个案例。刘备东征,大败于夷陵,卒于白帝。南中闻讯后骚动,常房行部牂牁,“闻褒(按:郡守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为了安抚朱褒,“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2]《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894}。常氏是蜀郡江原大姓,常房行部牂牁,听说朱褒有异志,便审问其主簿,并杀之,常房尽心公事之心昭然可见,诸葛亮对他的惩罚显然过分了。然而,解释者却理解为这是诸葛亮借机打击蜀中豪强。如此解释显然忽视了诸葛亮作出这个严惩的背景。当时刘备新死,蜀军精锐也在夷陵之战中丧失,而且在朱褒谋反之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王高定亦背叛”^{[2]《后主传》,894}。如果朱褒因常房的过激行为而加速反叛,那么南中的反叛就会一时俱起,声势巨大;如果再加兵蜀中,后果显然不可设想。诸葛亮严惩常房,为的就是尽量延缓时间,虽然同样过激,也是可以体谅的。

梓潼人杜微不仕与蜀郡张裕被诛也是一个例子。两人都出身大族,常被解释为益州势力集团反对蜀汉政权的代表。说杜微反蜀汉的根据有二条:其一,“及先主定蜀,微常称聋,闭门不出”;其二,诸葛亮苦心劝导他入仕,他却“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又致书苦劝,他还是不从,诸葛亮只得“拜为谏议大夫,以从其志”^{[2]《杜微传》,1019-1020}。表面看来,杜微似乎

有坚决不与蜀汉合作的态度。但若以此为准,对于刘璋,杜微也是不合作的,因为“刘璋辟为从事”,他“以疾去官”^{[2]《杜微传》,1019}。实际上,不能以出仕与否,来衡量他对政权的认同与否。《后汉书·逸民传》记述的都是不出仕的人,两汉蜀中严遵、任安、李业等亦不出仕。所以在没有更确切资料之前,只能说不出仕只是他的个人态度。至于蜀郡人张裕,刘备以“芳生兰门,不得不鋹”^{[2]《周群传》,1021}为由诛杀,但是他们的矛盾实在是私人恩怨和张裕不屈的个性使然。刘备初入蜀,与刘璋会于涪城,宴席上刘璋与刘备相互嘲笑,这是恩怨;个性则是他既公开谏“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又私下说“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2]《周群传》,1021},触犯刘备忌讳。不过,他之触犯刘备,倒不能说是代表某个集团公开挑衅,而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知识的忠诚。史载,张裕“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于地也”^{[2]《周群传》,1021}。他若不是坚定忠诚于自己的知识,是不会伤心得扑之于地的。陈寿评价他们为“诸生之纯也”^{[2]《周群传》,1021},是很允当的。

李严被诸葛亮处理,也被视为诸葛亮代表的“新人集团”(即刘备荆襄势力集团)对“旧人集团”(原刘璋属下的东州和益州本土势力)的整合。其主要依据就是李严自白帝受顾命,以诸葛亮之副的地位留镇永安,却不断受到诸葛亮的牵制,先调镇江州(今重庆),又以北伐为由抽调其二万部属入汉中,李严多有推却;为了让李严领命,特以李严子李丰代其镇江州,这是诸葛亮的“调虎离山”之计^{[8]185}。是说颇有道理,但是却忽视了诸葛亮的国家战略所在和蜀吴同盟的发展程度。从建兴六年(228)起,诸葛亮正式开始北伐,整个蜀汉国家都以北伐为中心运转,保证北伐是那时大小官吏的首要任务。同时,虽然刘备曾亲征伐吴,但大败之后,也接受了孙权的讲和请求。诸葛亮执政后,建兴元年(223),即“遣尚书郎邓芝固好于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2]《后主传》,894}。建兴七年(229),孙权称帝,“与蜀约盟,共交分天下”^{[2]《后主传》,896}。可见,吴蜀同盟关系已经相当牢固。诸葛亮调李严兵,据《李严传》是在建兴八年,可见诸葛亮并非是为夺李严兵权而找借口的。况且李严被废后,对诸葛亮并无怨言。诸葛亮死,他还因将不会有人识己感愤而死。诸葛亮对李严若真有私心,他岂会这样?

例子不止这些，不过已可看出蜀至诸葛亮去世前，由于内部普遍具有“兴复汉室”的信心，愿意出仕者又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是不应当有突出的地域势力集团矛盾的。

再回顾谯周，他出仕在蜀汉由极盛而衰之时，这种态度实际上也表明了他对“兴复汉室”的蜀汉政治纲领的认同和终将成功的信心。如果考虑到其祖上谯玄本就有不仕王莽、公孙述的佳话，他对蜀汉的认同更是不需要辗转思考的。相同的是，蜀中仕宦世家，其兴也在汉家。刘璋父子虽据蜀二十余年，但还是以汉朝益州牧的名义行使治权的。因此，当刘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入主益州，而且还颇有成功势头的形势下，益州本土势力与籍外势力矛盾并不突出，何况蜀汉政权提供的发展平台还颇为公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卒于渭滨前线，谯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2]《谯周传》，¹⁰²⁷，成为惟一一位到达前方吊唁的官员，突出地表明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情感。

二 谯周中年经历与蒋、费时期“兴复汉室”的信心维持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后，李邕上书后主云：“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5]卷十中《广汉士女》，⁵⁶⁸李邕此举颇有政治投机之嫌，只是后主对诸葛亮的感情真挚深刻而没有受到李邕的离间。不过，李邕所说的，因诸葛亮死而停止北伐则“宗族得全，大小为庆”，也确实反映了保守派的要求，特别在诸葛亮连年北伐几无战果的形势下，保境安民的意识是会慢慢生发出来的。实际上，保守派与进取派在诸葛亮决定北伐后就渐渐分化出来了，非仅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对此颇有暗示^⑥。早在建兴元年(223)刘备死后，魏大臣华歆、王朗等纷纷致信诸葛亮“欲使举国称藩”，诸葛亮没有回信，但却以《正议》明确宣示决不投降和北伐曹魏必将成功的理由^[2]《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⁹¹⁸⁻⁹¹⁹，显然是对蜀汉政权中的保守派进行劝说。不过，诸葛亮在世时，蜀之官民对北伐前途的普遍信心还能维持，所以当诸葛亮欲斩街亭战败的马谲时，李邕还曾劝谏说，“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争”^[5]卷十《广汉士女》⁵⁶⁸，他对马谲再建军功还抱有希望。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执政近二十年(234—253)，蜀汉主动对曹魏的进攻仅三次，即延熙十年(247)洮西之役、十二年(249)西平之役、十三年(250)第二次西平之役，而且战役规模都不大，“兵不过万人”^[2]《姜维传》，¹⁰⁶⁴。这其实是诸葛亮连年北伐无功后修养生息的需要和等待更佳北伐将领的结果，但其北伐的打算并没有放弃。蒋琬曾在一份上疏中描述了北伐之难：“今魏跨带九州，根带滋蔓，平除未易”，但仍以“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励^[2]《蒋琬传》，¹⁰⁵⁹。他不仅一窥见辽东公孙渊反魏，就集结大军于汉中准备北出，还谋划避开北出秦川的艰难，顺汉水而下，袭魏之魏兴、上庸，不得已而抱“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的目标，同时举荐熟悉凉州风土的姜维为凉州刺史，继续诸葛亮“平取陇右”的战略^[2]《蒋琬传》，¹⁰⁵⁸⁻¹⁰⁵⁹。费祎代蒋琬，鉴于蜀汉国力与人才的薄弱，努力抑制姜维的军事行动，但也并不是放弃北伐政策，而是出于“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现实考虑而采取“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来者，无以为希冀微幸而决成败于一举”的务实政策^[2]《姜维传》，¹⁰⁶⁴。费祎之后，姜维执政，北伐就又成了一种常态。不放弃北伐，就是对“兴复汉室”仍存信心的反映。

这从谯周身上也可看出。蒋琬执政时期，延熙元年(238)^⑦因“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2]《谯周传》，¹⁰²⁷，谯周为后主呈上一道谏疏，疏中举光武帝修德爱民、以弱胜强、终至中兴汉家的故事，夸奖后主即位之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的升平治景，提醒后主此时是“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且“先帝之志，堂构未成”，指出“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因此应该“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2]《谯周传》，¹⁰²⁸。从谯周上疏中不难看出，他对“兴复汉室”曾是真心期待、满怀信心的，对蜀汉已经取得的政治之美是极为陶醉的，因此后主一露出侈靡苗头，他就上疏切谏，要后主记住先帝的政治目标，保持先帝和早年的良好作风，并传之后代。不过，这道奏疏也暗示出让人信心降低的事件开始出现，但还未占主流，毕竟蜀汉政治还在诸葛亮设计的轨道之中远行。费祎之后，姜维一辅政便大举北伐，正反映了这份信心是占主导面的。

三 谯周晚年经历与蜀汉亡于益州势力集团说质疑

延熙十六年(253),蜀汉执政费祋遇刺于汉中,姜维辅政,蜀汉又开始了不顾国力、连年北伐的军事行动。费祋执政后期,蜀汉主动进攻过魏国三次,即前文提及的洮西之役和两次西平之役,都是姜维率领和指挥的,每次费祋都“与其兵不过万人”,既不能大胜,也不会大败。第一次取得了胜利,“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2]《姜维传》,1064};第二、三次都没有胜利,但只是没有达成目标,也没有太大损失。

姜维辅政后,北伐不再受人掣肘,他便常年率大军出征了。费祋遇害当年,姜维即率众围南安,遇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粮又尽,遂不胜而退。延熙十七年(254),“复出陇西,守狄道长李简举城降。进围襄武,与魏将徐质交锋,斩首破敌,魏军败退。维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2]《姜维传》,1064},这是一次大胜。次年(255),“复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经众死者数万人”^{[2]《姜维传》,1064},又是一次大胜。姜维连续两次大胜,对蜀汉朝野的精神提振应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次年(256),“迁维为大将军”,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珪”^{[2]《姜维传》,1064}。不过,这次满寄希望的大举,由于胡济“失誓不至”,姜维被魏将邓艾大破,“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影响及于蜀中,“众庶由是怨谿”^{[2]《姜维传》,1065}。

再看谯周。其《本传》载其上疏后主省减游观、娱乐等增造后,即载其所著《仇国论》。《仇国论》的写作背景是“军旅数出,百姓凋瘵。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具体年份是延熙二十年至景耀元年(257—258)^③。在此之前,新辅政的姜维数次大举伐魏,虽然颇有胜绩,但延熙十九年(256)与邓艾一役大败,朝野已普遍表达对战争的不满。次年,姜维仍“率数万人出骆谷”^{[2]《姜维传》,1065},完全不顾民力国力。谯周《仇国论》因此有感而发,它以寓言方式,以因余之国比蜀汉、肇建之国比曹魏,讲述二国对峙形势已经稳固,曹魏强大、蜀汉弱小,蜀汉不该贪图边境小利、连年兴兵,而应仿效周文王善治境内以待后来,否则民力疲劳、上慢下暴,国家就有动摇崩溃之险。与上篇谏疏对后主谆谆劝诫、深切讲述弱能胜强的道理相比,《仇国论》揭示的是以弱胜强已没有可能,原因一是强弱悬殊,二是当时魏国

如殷周一般业已“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不过,谯周不赞成用兵的原因还有一条没说,就是蜀汉政治已经腐败,后主不仅没有听进谯周二十年前奉行节俭的劝谏,反而宠信宦官黄皓,朝政益乱^④。自身政治都还大有问题,想伐人之国取胜,显然只是让人民送死。不过,尽管甚为反对穷兵黩武,该文却以文王之政是求,说明谯周对蜀汉并没有丧失信心。延熙十三年(250)前,谯周就已听说当时流传的讖纬“代汉者当涂高”,指取汉朝而代之的是魏^⑤。他还以文王之政期许蜀汉,更能说明这点。

景耀元年,姜维返回成都,直至景耀五年(262)才再出师,大概他也意识到国贫民困了。但是这四年、五年间,蜀汉的政治却更加腐败下去。因为自景耀元年陈祗死后,“宦人黄皓始专政”^{[2]《后主传》,899}。姜维该年的出师,其实也是不得已。《华阳国志》云:“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2]《姜维传》,1066}蜀汉政治已经腐败到需要辅政大臣委曲求全的程度。姜维提出种麦,亦足见蜀汉当时国贫民弱,真是很难支持战争了。

其实,武将方面反对伐魏的也很多。延熙十八年(255),姜维要求大举兵再出狄道时,征西大将军张翼即争辩,“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为防其掣肘于内,调往同行。取得大胜后,张翼又力劝姜维适可而止。延熙十九年,姜维与胡济约定会师上邽伐魏,胡济失誓不至,导致姜维孤军大败,隐含的便是胡济对伐魏的不认同。另一重将廖化也针对景耀五年姜维出兵北伐不客气地指出:“‘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2]《宗预传附廖化》,1077},反对对魏用兵。

景耀六年(263),司马昭以三路大军伐蜀,邓艾认准蜀汉国力空虚,“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9]《邓艾传》,779},突然进入蜀中腹地,“百姓扰攘,皆进山野,不可禁制”^{[2]《谯周传》,1030}。诸葛瞻抵御大军又在绵竹被击溃,蜀一时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力量。朝议对策,这时“不与政事”的谯周主动站了出来,否定了入南中和奔东吴的提议,力主投降。后主还想入南中,谯周再次上疏,陈说不可入南中的道理。后主采纳了谯周的建议,并派出使者向还在成都百里之外的邓艾递交降表。从当时蜀

汉国力和魏军形势来看，蜀汉并没有必然亡国的形势，所以谯周成了历代所谓蜀汉亡国的直接罪人。由于谯周是益州籍，现今的研究者多据此指出：“蜀汉的亡国主要应是亡于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出卖。”^[10]但是，谯周之举真是为益州势力集团代言吗？就当时廷议唯谯周一人主张投降来看，其实已经暗示出他不代表任何集团了。实际上，对于姜维的穷兵黩武，蜀朝廷也达成了抑制共识。就以上文提及的反对北伐的武将来看，张翼是益州犍为人，廖化是荆州襄阳人，胡济籍贯不知，但应当不是益州人（《华阳国志》也没有他的记载）。以文官来看，新统朝事的诸葛瞻、董厥等都不是益州籍，却也“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敝，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东晋时“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2]《诸葛亮传》注引《异同记》，933。显然，这不只是益州本籍势力的意见。那么，又会是谯周一己之私的打算吗？

前文提到过，谯周向蜀中讖纬学者杜瓊请教过“代汉者当涂高”的意思，当时谯周末之深信，但后来谯周根据历史人物名字暗合“天意”的案例，推导出汉室在刘备、刘禅父子手中正式结束的结论：“周缘瓊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于穆侯、灵帝之名子。’”^[2]《杜瓊传》，1022 谯周是何时作出如此判断的呢？史未之言。但前已论及，在 257—258 年间，谯周对蜀汉尚有信心。《杜瓊传》中提到：“后宦人弄权于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2]《杜瓊传》，1022 因此，谯周纵然很早便作过这样的类比推理，当时也并未深信；至该年，蜀汉内政已深为堪忧，而宫中大树竟无故自折，具有天命思想和讖纬学背景的谯周不得不深思，于是他才在柱子上写下亡国预言。更为奇怪的是，他公开宣布亡国论调，却没有任何惩罚记载遗留下来，看来当时上至后主、下至吏民无不认识到亡国是必然之事了。恰巧次年，魏国兴兵数十万伐蜀，这看起来很像“天意”。

谯周主张投降的依据是什么呢？不是讖纬暗示的“天意”，而是小不可敌大的道理（与当初苦讲以弱

胜强的道理刚好相反）和魏志在统一，入南与入吴终究会面临成为魏国俘虏的问题，主动投降反而能得到好处，“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2]《谯周传》，1030—1031。不过，最后他还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2]《谯周传》，1031 由此不难看出，谯周劝降的根本原因是他的天命观，他认为顺从天命是圣人之举，历史上没有不亡之国，尧舜禅让就是知悉天命的反映。他还相信天命已经在魏，早日归顺便是顺应天命，会得到天的嘉奖，“可获爵土”，否则“其祸必深”。谯周的理由说服了后主，后主主动投降。

谯周没有忠于蜀汉，但忠于了他的知识。谯周七十岁后，曾对陈寿说：“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扬同轨”^[2]《谯周传》，1033，他是以接续孔门道统自命的，他在认为自己看清天命去就之后，就有助人顺从天命的担当，所以他敢站出来鲜明坚决地主张降魏。这必定不是只有谯周才信奉的，刘禅同意，蜀中除北地王刘谏激烈反对外，并无反对之声，显然这已是当时的共识。

司马氏认为，谯周劝降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但“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还向学生文立预言司马昭的死期，临终时预见司马氏会赐朝服敛棺，特嘱其子“勿以加身”^[2]《谯周传》，1032—1033。可见，谯周劝降后主，也无获取私利的动机。

因此说谯周是益州势力集团的代表、为本土利益出卖蜀汉是不太有道理的。刘禅同意投降后，并没有发生过益州籍内外官员的争论，降表也是河南人郤正写的。而从西晋时期入仕的蜀人来看，这个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入西晋后，成名的蜀中本土人才，如文立、李密、陈寿等人都曾仕蜀，且在蜀已是官声在外^①。这些先仕于蜀者，不仅没有对蜀汉政权进行诋毁，还百般回护。如文立表请武帝叙用诸葛亮、蒋琬等蜀大臣子孙，“以慰巴、蜀之心”^[2]《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1032。李密答司空张华刁难时，辩刘禅为“可次齐桓”的人主，诸葛亮“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11]卷九十八《孝友传》，2275—2276。刘禅东迁，巴蜀人士在洛阳者对他还常常规谏。显然，他们

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敌对蜀汉政权。

所以结合谯周的一生来看,蜀汉的骤然亡国,是蜀汉在三国长期对峙中国力越来越弱、民众越来越贫困、统治集团“兴复汉室”的信心逐步丧失的结果。而且,在当时普遍的知识水平下,蜀汉朝野人士已认

为天下统一于魏是即将成为现实的必然,主动顺应这个必然是对蜀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事情,因此,当谯周对后主晓以这些道理时,就获得了劝降的成功。所以,蜀汉的骤然亡国,很难说是蜀汉内部地域势力集团矛盾演化的结果。

注释:

- ①曹魏自明帝之后,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即明朗化,政治甚为严酷。而孙吴在孙权晚年即陷入衰败,“逸说珍行,胤嗣废毙”。至于治理状况,有学者统计,自建安元年至西晋灭吴(196—280)的85年中,曹魏境内发生了24次农民起义,东吴发生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仅有3次农民起义。详见:李兆成《蜀汉政权与益州士族》,《四川文物》2002年第6期。
- ②对此,王仲荦先生倡议较早,他说:“在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看来,蜀汉政权并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相反,这一政权的覆亡,反可驱逐荆楚等外来地主势力于益州之外,而使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见《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另如张承宗、郑华兰认为蜀汉灭亡是人才本土化缺失之故(见《蜀汉人士与蜀汉兴亡》,《襄樊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罗开玉先生认为蜀汉政权建立之后,从根本上抑制、打击土著豪族势力,经济上进行掠夺,仕途上排挤、限制土著豪族,客、主矛盾尖锐化,以致土著豪族势力对蜀汉的灭亡袖手旁观(见《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白杨、黄朴民先生虽把蜀汉的势力集团更加细化,矛盾运动中的变化分析更加具体,但最终的结论还是益州本土势力壮大、外来势力衰弱,两者由于遗留的历史失误政策无法整合,蜀汉面对外部形势的突然变化而灭亡(见《论蜀汉政权的政治分化》,《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 ③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建安二十五年(220),谯周已为劝学从事,参与为刘备称帝寻找依据的符谶搜寻工作中。但任乃强先生认为此误,此处谯周应为周群,理由足信,可从之。详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六《刘先主志》注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 ④这些人是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赭、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瓊、劝学从事张爽、尹默,其中殷纯、张爽不知籍贯,但也当是蜀人。
- ⑤《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云:“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第868页)
- ⑥如其云:“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敌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23—924页)摆出本身的困难,为的就是不受以此为借口的阻挠。有疑《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作,对此,李伯勋有驳证,可从之。详见:李伯勋《〈后出师表〉非伪作述略》,《诸葛亮集笺论》,第200页。
- ⑦《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后主立太子,以周为仆,转家令。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疏谏曰……”(第1027页)后主立太子,据《后主传》在延熙元年,开始游观在建兴十四年(236),因此,谯周上书当在延熙元年或稍后。
- ⑧《三国志·蜀书·谯周传》既云“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第1029页),则其时陈祗已为尚书令。《陈祗传》云“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第987页),《吕乂传》云“延熙十四年卒”(第988页),则陈祗为尚书令在该年,即251年。又《仇国论》写作背景是“军旅数出,百姓凋瘵”,这当指姜维辅政后,数次兴师之举。然姜维自辅政后兴师起于延熙十六年(253),其后十七、十八年继之,未有败绩,且获两次大胜,此时不当有非议。惟十九年(256),姜维再次大举而大败,“众庶由是怨黯”,此后反省北伐者当多。二十年(257),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蜀、吴皆以为北伐良机,于是是年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而《仇国论》中又提到“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覬增其疾而毙之也”,是趁魏内乱北伐的理由;而该文结尾又说“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明显嘲笑力量不如、又智慧不及者之莽撞行为,与十九年姜维为邓艾所大破相应。所以《仇国论》便当作于姜维延熙二十年有再发兵意图后。而陈祗卒于景耀元年(258),于是《仇国论》便作于延熙二十年与景耀元年间,延熙二十年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那时正好是诸葛诞叛魏消息传来,蜀朝廷商量应对办法时。
- ⑨延熙九年(248),陈祗代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详见《三国志·蜀书·董允传》,第987页。
- ⑩《三国志·蜀书·杜瓊传》记谯周曾问杜瓊:“昔周征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瓊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瓊又曰:“古者官职不言曹,始自汉以来,名官尽言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谯周听后,当时大概未为深信。另《杜瓊传》云:瓊延熙十三年卒,则谯周必于此前垂问。

①如文立,“刺史费祎命为从事,入为尚书郎,复辟祎大将军东曹掾,稍迁尚书”(《谯周传》注引《华阳国志》,第1032页);李密,“州辟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奉使聘吴”,“吴主及群臣皆称善”(《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第1078页)。可知二人官职皆不低。陈寿仕蜀则为观阁令史。《世说新语》亦云蜀汉末年“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姜维传》注引,第1067页),可见蜀汉政权也是得蜀中人才认同的。而他们还都是巴蜀大族出身,因此以为蜀汉政权不得益州大族拥护的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

参考文献:

- [1]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J].文史哲,1982,(5).
- [2](晋)陈寿.三国志:蜀书[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张承宗,郑华兰.蜀汉人士与蜀汉兴亡[J].襄樊学院学报,2002,(3).
- [4]颜勇.主客矛盾与蜀汉政权的失败[J].贵州文史丛刊,1993,(2).
- [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6](宋)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7]李伯勋.诸葛亮集笺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 [8]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C]//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4.
- [9](晋)陈寿.三国志:魏书[M].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0]叶哲明.重评蜀汉姜维北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1).
- [11](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The Reasons for Subjugation of Shuhan from the Life of QIAO Zhou and Refutation of the Contradictions Geographical Forces Group

WANG Gu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opinions as to the reasons for the subjugation of Shuhan,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in recent years is the conflict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forces Group. However, this assertion is proved to be inadequate with a close inspection.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Shuhan should be better divided into the aggressive group and the conservative group. Actually the subjugation of Shuhan was firstly due to the infeasibility of its political objectives, the worsening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ublic due to foreign wars and 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Secondly the loss of confidence coincided with the prevailing perception and therefore led to QIAO Zhou's success in capitulating the emperor.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QIAO Zhou just vividly illustrated the whold process.

Key words: the reasons for subjugation of Shuhan; the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forces group; QIAO Zhou

[责任编辑:凌兴珍]